

内 容 提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具有苏联的一党制和欧美的多党制所无法比拟的政治优越性。研究和探讨多党合作制是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现实需要，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理论课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证了多党合作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阐明了多党合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建立、形成，到社会主义时期不断发展并成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历史过程；论述了多党合作对开辟新中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建国41年来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多党合作制带有规律性的基本特点；提出新时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多党合作制应当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全文分为：多党合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则；多党合作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多党合作的基本历史脉络；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等四个部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经受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为开辟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已被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具有苏联的一党制、欧美的多党制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对于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发展，总结其历史经验，探索其不断完善的途径，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一、多党合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则

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多党合作的光辉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共产党宣言》精辟地阐明了共产党人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争取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不仅要联合工人阶级的其他政党，还要联合社会主义民主党，甚至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所以要同工人阶级其他政党联合，是因为共产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工人阶级其他政党所代表的工人的具体利益是大体一致的；之所以要同社会主义民主政党联合，是因为彼此在反对资产阶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之所以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联合，是因为他们也反对封建专制，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与他们有相同之处。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无产阶级争取联合其他民主政党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列宁实践并发展了马恩多党合作的思想。

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的一帮’，恰巧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②后来，列宁又指出：“只有自己毫无把握的人，才会害怕甚至同不可靠的分子实行暂时的联盟——而无论哪一个政党，不实行这样的联盟，就不能存在。”^③为此，在整个俄国民主革命期间，列宁都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了时间上或长或短的联盟。列宁强调指出实行这种联盟的必要性，他说，“没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④1907年，列宁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文中把“联合各劳动派政党，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叛变的自由派”列为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两

个总原则之一。⑤十月革命后，列宁告诫无产阶级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并尖锐指出：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⑥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⑦他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⑧可见，列宁是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继续实行多党合作。事实上，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吸收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政党参加苏维埃政府，当时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什坦因别格等七人担任人民委员。一九一八年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破裂后，还同从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化出来的“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继续合作，直到一九二〇年，这两个党派先后自愿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才形成苏联的一党制。限于苏联的历史条件，列宁关于多党合作的设想没有完全实现，但列宁多党合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多党合作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提出一整套多党合作的理论、方针与政策。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41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就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⑨1942年，毛泽东又强调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⑪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这是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在革命政权建设上的光辉实践。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并提出“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⑫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经验并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⑬随后，正式提出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⑭

在“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解散和取消民主党派。毛泽东针对这一阴谋，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在每个历史阶段毛泽东都提出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这一重要原则。毛泽东多党合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几十年来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多党合作制。

二、多党合作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个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从新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成为今天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不取决于任何政党和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具有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社会阶级结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人数都只占少数，农民和其他中间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却占有人口的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一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它在不同程度上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造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不可避免地带有散漫性、动摇性等弱点。更由于旧中国国家不统一，长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不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等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各民主党派不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担负起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他们要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就必然要向工农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和合作。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毕竟只占中国人口的一小部份，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本阶级的力量推翻三座大山，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它也必须争取团结一切拥护革命的中间阶级、阶层及其政党以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必然形成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是反帝爱国、争取民主，这同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这种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成为多党合作的坚实基础。民主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创建的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如上所述，多党合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产物。在社会主义时期，多党合作制不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完善，这同样是由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作用所决定的。

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随着经济基础的丧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随着我国阶级状况的变化，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它们由原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阶级联盟，发展转变为它所联系的一部份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民主党派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面十分广泛。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由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联系着一大批原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及同国民党有历史关系

的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是由原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已包括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的成员主要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出版、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广泛联系着知识界；中国致公党——是由归侨、侨眷及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由台湾籍同胞和其他台湾人士组成的，这两个民主党派广泛联系着归侨、侨眷、台港澳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据统计，民主党派联系的人数几近一亿之多，他们具有三大优点：（一）比较有知识；（二）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三）有为国出力的强烈愿望。

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时期性质上的变化，使它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能够发挥其历史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民主党派荟萃了多方面多学科的高精尖科技人材，有“智力集团”之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它在带动国内知识界和沟通国际科技文化的交流上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派中的工商业界人士和经济界的专家学者在工商经济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同国际经济界也有广泛联系，能够在加强经济管理和开展国际性经济交流中作出重要贡献，十分有利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2、维护安定团结，促进祖国统一

民主党派联系着十分广泛的阶层和集团，他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其他人民群众是一致的，但在局部的具体的利益上又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他们各自又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意愿，民主党派能够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通过人民内部的民主协商得到妥善解决，民主党派又能够团结、教育、引导他们，化各种有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显然，这是十分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需要有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主党派同国民党人员、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和深刻的影响，这对于沟通与促进海峡两岸的往来，进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加强民主监督，改善党的领导

1945年，民主党派的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对毛泽东说，很多团体和国家都没有逃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他问中共怎样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⑮可见，民主监督，事关共产党的兴败存亡！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领导着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国家政权，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而民主党派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发挥监督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邓小平曾经指出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份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又说，民主党派“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⑯民主党派作为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友党，出于自身有知识、有经验、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等有利条件，能够有效地加强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这对于加强和改

善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主党派的历史性作用充分说明了它在社会主义时期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也充分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乃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三、多党合作的基本历史脉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历史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加以论述。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同第三党的合作是多党合作的开始。

第三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一部份国民党左派人士及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人为寻找国共以外的第三条道路而组建的新党，1928年成立时，称“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斗争目标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承认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由广大的劳动平民阶级共同完成这一革命，但认为中国革命领导权应当归属于它。成立之初的第三党曾经寻求同共产党的联合，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左”的倾向，这种合作关系没有实现，此后，两党关系恶化。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成为两党合作的契机。当时中共已摒弃了排斥其他党派的“左”倾政策，号召各党派联合抗日。第三党经过几年反蒋斗争屡遭挫折，深感既反蒋又排共“老是在夹缝中奋斗，左右受敌”是不行的，不应再提什么三条战线的厮杀，同时，第三党也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第三党从抗日反蒋排共转变为抗日反蒋联共，并且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同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政党合作。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改变了政治态度，他们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感召和全面抗战爆发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党派，构成了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抗战初期，蒋介石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被迫开放了一些民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间党派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对其反动本质缺乏认识，不了解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在主张抗日、民主的同时却又几乎一致拥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在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同时顽固推行消灭异己的政策，不断排斥打击中间党派，事实教育了中间党派，使他们开始改变了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看法，认识到无论是民主还是抗日，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此期间，中共则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和团结，有力地推动了中间党派的联合。1941年3月19日，在中共的支持下，各个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包括三党：第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三派：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路线，从它成立之日起，中共就同它建立了合作关系。同盟的领导人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共才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和“最可靠的朋友”，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一个松散的党派联合体改变为政党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它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响应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对民盟领导人做了大量团结争取的工作，为两党合作

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共与民盟达成了“任何一方不得与国民党妥协，在任何会议上双方互相支持”等协议，这个协议开创了中共与民盟的政治合作。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生死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参政，在这个时期，成立了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他们认为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中国非搞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得救，主张在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即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某些代表人物自恃其全国第三大党的地位，极力鼓吹“中间路线”。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都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上，各民主党派密切配合中共，迫使旧政协通过不利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五项决议。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各民主党派表现了鲜明的正义感和革命性，他们同中共站在一边，（除了青年党、民社党投靠国民党外）他们抵制“国民大会”的召开，反对伪宪法，拒绝参加“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发动和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野蛮地推行法西斯主义，镇压民主运动，迫害民主党派，制造了殴打民主党派的较场口事件，暗杀了民盟中央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勒令解散民主同盟。这一系列血的事实粉碎了民主党派“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和严肃批判、耐心帮助下，各民主党派回顾艰难曲折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中间路线”在中国行不通的事实和道理，终于抛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倒向新民主主义一边。从此，民主党派从联共转到了拥共，开始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解放战争积极贡献力量。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这一号召并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各民主党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正式形成。

在多党合作的形成过程中，中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多党合作的指导思想，积极团结，真诚帮助各民主党派。在许多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都给予民主党派以有力的援助。抗战期间，中共曾坚定地支持第三党，反对和抵制蒋介石解散第三党的阴谋；在民主政团同盟处于困境时，是中共出钱出力资助它创办了机关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之始就得到中共的全力支持；当民盟遭解散，是中共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保护民盟领导人安全转移；在蒋介石镇压民主党派的“下关惨案”中，共产党人为了保护“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而洒下了鲜血；而民建、民革的成立无不得到中共的推动和支持；至于九三学社之从“民主科学座谈会”转变为一个党派组织更是直接受益于毛泽东的亲手指点。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①7}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应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多党合作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经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在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中有3名是民主人士，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26名民主人士，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占了2名，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委、署、院的领导中，民主人士约占 $1/3$ ，有的占 $1/2$ 以上。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从建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阶段，多党合作制得到巩固和发展。

民主党派人士不但参加中央人民政府还担任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有职、有责、有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双月座谈会，协商座谈会、政协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等形式同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和国家在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改造企业和改造人并举的方针。由于党在当时对民主党派坚持团结为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积极引导民主党派投身于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党派顺利地越过了土地改革关和社会主义改造关。割断了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系。民盟、民进在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还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民主党派还积极配合党工作，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同时，使自己转变为联系一部份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份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民主党派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充分显示了它的政治优越性。

正是由于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1956年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多党合作比只有一个党好，中共八大决议正式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民主党派受到了很大冲击，一大批民主党派的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在“左”的影响下，“长期共存”被说成是以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为前提，“互相监督”被说成是对民主党派实行以阶级斗争和改造为纲。多党合作的关系受到了损害，但由于民主党派同中共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已形成了牢固的合作基础，反右派的严峻考验并没有动摇民主党派跟共产党走的根本路线。1959年后，中共中央采取政策措施，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分批给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底到1961年，我国经济处于暂时的困难，在此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普遍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推动了世界观的改造。1962年，周恩来对统战工作提出了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从1958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虽然“左”的思想已经存在，但民主党派仍然参与国家大政的协商，不少民主党派人士仍然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由于坚持和改善了多党合作的关系，在举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1962年至1966年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

和发展，使国家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十年浩劫中，各民主党派都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民主党派被当作专政对象，不少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成员被害致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仍然没有改变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定立场。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虽身陷囹圄，但始终不屈服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没有忘记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同登天安门，他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民主人士李宗仁说：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周恩来在逆境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千方百计保护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多次指示不要批斗民主党派的各级负责人。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一道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峻考验，十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经历为新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打下了更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开辟了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⑮党的十二大肯定了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十六字作为多党合作的方针，这十六字不仅表明了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和民主党派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共同责任，十六字方针的制定，进一步加强了多党合作关系。

邓小平作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总设计师，对新时期多党合作作了许多精辟论述，提出和确定了一系列多党合作的基本原则，从而为多党合作揭开了新的篇章，开拓了远大的前景。他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光荣历史和重要贡献；指出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高度评价了多党合作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容。1990年一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是邓小平关于多党合作重要论断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意见》是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而制定的。中共中央组织了包括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内的专门小组起草了《意见》，随后又由中共中央正式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而确定下来。正如有些民主党派领导人所说：“在这个文件历时一年的起草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精神。文件本身就是多党合作的产物”。《意见》对多党合作的指导思想、内容与措施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指导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的纲领性文件。《意见》的公布，标志着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已被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下来了。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各项工作进行拨乱反正以后，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协商密切。据统计，从1979年初到1989年底，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出面主持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达三十三次，超过文革前十七年的总和。中共中央坦诚地向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通报国家大事与拟采取的方针、政策，真心实意地听取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和批评。这种充分民主的政治协商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前进。二是大批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直接参加各级政权。从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安排一定数量党外人士担任各级领导的决定下达后到1989年底，全国担任县级以上政府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已达781人，其中有14人，担任了省部级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一年多来，多党合作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这主要表现在：

1、民主协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不但中央，地方各级也都参照《意见》的规定，制定或完善了地方的民主协商制度，普遍做到就地方重要事务，经济发展计划和重要人事安排等同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协商。

2、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取得新进展。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计，至1991年3月为止，担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已有近1200人，其中任国务院各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有9人；任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有9人，任计划单列市副市长的有8人；任地区级领导的有89人，任县级领导的有1042人。还有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各级政府所属各部门的领导工作。

3、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渠道逐步拓宽，各级政府与民主党派加强联系的形式更加多样，民主党派知情出力，进一步发挥参政、监督的作用。

4、民主党派为四化建设服务成绩显著。《意见》的公布进一步调动了民主党派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各民主党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就各项建设事业为国家提供重要咨询，不少建议已被有关部门采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已经充分显示出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优点，在我国政治生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日益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四、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历了41年的历史道路，探索其带有规律性的基本特点，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必要的客观依据。

我国多党合作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特点：

1、各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共的领导，同时又同中共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不断巩固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作出的历史选择。这种领导地位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确认。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多党轮流执政。

2、各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下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各民主党派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份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份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他们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实践。

3、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我国各政党没有朝在野之分，不存在反对党。

4、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方式。经过政治协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民主党派所接受，同时充分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5、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优点，实践证明：它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实行民主监督，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心协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有利于协调和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维护安定团结，巩固人民政权；有利于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显然，我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正是由多党合作制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失去了上述基本特点也就失去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所以坚持多党合作制的基本特点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的客观依据。

为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们认为：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要处理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关系。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协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是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一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两条主线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就要陷入动乱和倒退，根本谈不上人民民主更不存在民主监督，“文化大革命”和89年北京动乱就是明证。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民主和民主监督，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进一步发扬民主。发挥民主监督则是为了保证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以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民主监督不是此长彼消，此弱彼强的对立、排斥关系。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法是：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发挥民主监督，不允许借坚持党的“领导”之名来压制民主监督，也不允许借“民主监督”之名行削弱、取消共产党领导之实。民主监督应以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为范围，任何背离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主张都应当加以坚决反对。

周恩来早在建国初就说过：“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他们说的话不一定都对，但只要有一点好的，我们都应当重视。愿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须去听，特别是要能听不同的意见。”^①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要职，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和协商，他常常把不同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自解放后到逝世的16年间，黄炎培先后给毛泽东写了100封左右的信函，平均不到两个月就写一信，就国家大事慷慨陈言，毛泽东给他的信也有60多封。他们的书信往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深厚情谊，也为我们提供了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协商的光辉范例。邓小平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②1957年反右派的扩大化就造成了民主党派不敢大胆讲话。在这种心态下，就造成了经济决策上的错误不能及时地得到纠正。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民主党派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参政也好，监督也好都难以收到良好效果而只能是形同虚设。

2、要处理好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关系。保持和发展民主党派的固有特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没有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加强党的领导不是削弱民主党派的地位，而是巩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有利于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和活动。民主党派是合法的政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实现领导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主协商，在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一致的前提下，放手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这恰恰是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所以二者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应当是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开展工作与活动。

我国民主党派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的党派，其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还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和极少数的共产党人在内。这种组织上的广泛性就造成了思想政治上的广泛性，这是民主党派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这一特点，它能同共产党合作互补，也有利于以不同于共产党的角度看问题，有利于民主监督。周恩来说：“如果各民主党派的思想作风都和共产党一样，又何必有这几个党派存在呢？”^{②④}各民主党派又都有自己的特点能发挥其特殊作用。例如中国致公党的突出特点是海外关系广泛。近年来，致公党曾单独组团出访美国、加拿大及东南亚，同100多个华侨团体建立起密切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时期需要建立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保持和发展民主党派的固有特点也是形势的需要，相信将有更多方面的爱国者涌进民主党派组织，民主党派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3、要处理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亡，他们已转化为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矛盾已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解决，决不能使用阶级斗争手段来处理，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的教训应当记取。在新时期，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友党，不但根本利益一致而且都有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的奋斗目标，二者由于认识等原因造成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民主协商求得妥善解决。问题与矛盾的解决更有利于工作的推进。

此外，还应当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

多党合作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双边关系，要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除了中共的因素，还取决于民主党派方面的因素，这就需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不但是实行同中共长期共存的重要保证，也是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和进一步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条件。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首先是应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应当继续充分发挥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积极作用，以往有些地方把在社会上负有盛誉，深有影响的老一辈领导人发展为中共党员的做法是欠妥的，让他们留在党外比吸收入党将更有利于发挥他们原有的影响，更有利于为党工作。建设好领导班子还应考察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来充实加强领导班子，以做好新老交替。在发展组织时，应排除共产党内的“左”的思想障碍，共产党组织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发展其适宜的对象。民主党派在发展对象时应按各党派划定的发展范围、有针对性的发展成员，这样做也有利于保持和发展民主党派的固有特点。在思想建设方面，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保持和发扬民主党派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建设内容。为了进一步发展多党合作制，还应当重视中共党史、民主党派史和多党合作史的

教育，使广大民主党派成员认识到中共和民主党派多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久经考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多党合作关系正如一位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所说的：共产党象恒星，八个民主党派和一个工商联共九个，象九大行星。恒星和行星之间互相吸引，共同组成了银河系中无比灿烂的太阳系！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152页
- ③ 《列宁全集》第5卷第328页
- ④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31页
- ⑤ 《列宁全集》第12卷第482页
- ⑥ 《列宁全集》第30卷第52页
- ⑦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
- ⑧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8页
- ⑨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3卷第811页
- ⑩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3卷第827—828页
- ⑪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⑫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四卷第1438页
- ⑬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 ⑭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4页
- ⑮ 黄炎培《延安归来》
- ⑯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 ⑰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8页
- ⑱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
- ⑲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89—190页
- ⑳ 《邓小平文选》第134页
- ㉑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3页